

中国人文讲演丛书

# 从俗世中来， 到灵魂里去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俗世中来,到灵魂里去/谢有顺 主编. —郑州:郑州大学出版社,  
2007. 1

ISBN 978 - 7 - 81106 - 467 - 4

I. 从… II. 谢… III. IV. 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 )第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

邮政编码:450052

出版人:邓世平

发行部电话:0371 - 66966070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制

开本:

印张:

彩页

字数: 千字

印数:

版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号:ISBN 978 - 7 - 81106 - 467 - 4 定价:26.00 元
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社调换



# 目录

---

- 1 第一讲  
从俗世中来,到灵魂里去
- 41 第二讲  
文学的事:人心的省悟
- 75 第三讲  
一个人的记忆和悔悟
- 87 第四讲  
作家要背负精神重担
- 101 第五讲  
文学叙事中的身体伦理

- 
- 113 第六讲  
叙事也是一种权力
- 133 第七讲  
重申长篇小说的写作常识
- 141 第八讲  
颂歌时代的写作勇气
- 157 第九讲  
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
- 167 第十讲  
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
- 177 第十一讲  
死去的事实需要活的理解
- 191 第十二讲  
诗歌与什么相关
- 201 第十三讲  
词语的冲突及其缓解方式

第十四讲

219

文学写作的精神通孔

第十五讲

247

重申文学的信念



# 人文中国 讲演丛书

## 第一讲



## 从俗世中来,到灵魂里去\*

### 文学是关乎人心、解释灵魂的

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文学。在座的,很多都是我的朋友,有一些人,之前虽然没有见过面,但也已通过文字相识了。今天我会花一些时间,郑重地把我对文学的一些看法讲出来,我也期待你们的积极回应。我知道,在这个时代,很多人都对文学持游戏和嘲讽的态度,相信你们中间,也不乏这样想的人,有些人,甚至一直以讥讽文学、奚落诗人为勇敢的事,这些,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但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。在我眼中,文学依然

\* 二〇〇六年七月在广东省作家协会“文学创作继续教育培训班”上的讲演。

文学作为建立优雅生活、探求精神秘密的载体之一，  
依然在许多人的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是一件严肃的事——值得认真、郑重地对待的事。今天的文学界，缺的不是游戏的精神，而是缺乏郑重之人。哲学家梁漱溟说，中国人常常有逐求、厌离、郑重这三种人生态度，若能经“逐求”和“厌离”，再跨入“郑重”，即为人生之化境。“我之所谓郑重，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，求其自然合理耳。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，如儿童之能将生活放在当下，无前无后，一心一意，绝不知道回头反看，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……”我个人，从梁先生的话中，得了启发，所以，这一两年来，无论阅读还是写作，都有了诸多调整，好使自己成为“郑重”之人。而要跨入“郑重”，就要“将生活放在当下，无前无后，一心一意”，这是很难的。逐求者，占了文坛的大多数；厌离者，似乎也不少；唯独郑重者，不常见到。

以郑重者的眼光看，今天的文学，尽管多有缺陷，但也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不堪；文学尽管从生活的主流退出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丧失了它自身的价值。事实上，文学作为建立优雅生活、探求精神秘密的载体之一，依然在许多人的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我举一个例子。上两周，也就是今年七月一日的时候，我受邀去“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”作了一次讲演，去之前，深圳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林晓东先生，作为这个讲坛的策划人之一，他给我定的题目是“今天我们如何欣赏文学”，我后来考虑到，在深圳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城市里讲文学，听众一定会很少，于是就向晓东建议，把我的讲演改成一个宽泛些的题目，叫“我看中国文化的现状和走向”。我是照着这个题目做的准备，没想到，由于一些环节没有对接好，深圳那边的所有宣传资料、新闻预告里，题目并没有改，还是沿用“今天我们如何欣赏文学”。出乎我的意料的是，那天的讲演，总共来了四百多人，会议室完全满了，有些人只好一直站着听，他们可都是冲着文学来的。据主办方介绍，这是“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”几十场讲演里（包括一些文化明星之前都来讲过），人数最多的几次之一。当时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想，觉得文学的热情，依然在很多人的心里燎原，我们根本不必过分悲观。文学并不像一些人惯常所说的，它早已被边缘化了，其实这只是相对于二

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言。八十年代的文学，是过度火热了，今天这种不热但也不冷的状况，在我看来，最为正常。

前几天，碰到我的老朋友、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一个副主编，刚聊了一会儿，他就劝我，别研究文学了，谈点文化话题吧，“文学没有什么人关心了”——这是他的原话。我马上说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文学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“没有什么人关心了”，关心的人，其实还有很多。你看，今日媒体或网络上很多有影响的话题，都和文学或作家有关，摆在图书城最醒目的位置上的书，很多也是文学书；我甚至说，街上卖的盗版书，有一多半是文学书，最热的博客，作者往往都是文学素养较好的人……有很多的证据表明，文学的影响力仍旧遍及当下生活的各个角落。那些藐视文学的人，不过是对文学存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罢了。在座的各位，都是省里小有名气的作家，面对这种状况，你们是灰心还是充满信心？我觉得，各位有必要重新建立起对文学的基本信念——这个信念甚至无关乎读者有多少，而只和文学本身发生关系，那就是：文学到底有什么价值？这个时代还需要文学吗？



对此，我是有信心的。你们或许注意到了，中国人在文化传承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，自古以来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、终极的宗教传统，正因为此，林语堂先生才说，“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”，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。比如唐诗，哪个不觉得好？好到一个地步，就成了一些人的宗教。你想，中国人从四五岁开始，张口就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、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，一直到老，古诗都还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这是不得了的事。除了文学，别的任何知识，都达不到这个效果。我昨天看凤凰卫视，学者蒋庆在“世纪大讲坛”讲复兴儒学的问题，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，但思想路径上有问题，这里我暂时不作辨析。只是，我听下来，觉得要复兴儒学，光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是没有用的。儒学要重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，一定要经过话语转换；没有合适的话语作载体，儒学离现代人的生活还是太遥远、太难懂了。什么样的话语载体最

今天,文学若衰败,其他的知识领域,无论是政治的,还是科学的,必定也受到影响。

好?肯定是文学。文学在本质上是大众的,它的一些形式,像小说,早已成了文化人不可或缺的读物之一。假如能用好文学这个载体,很多艰深、重要的价值话题,都可以得到普及。可惜,很少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、思索中国文化命运的时候,能够重视文学的作用。这一点,五四时期的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等人,就要高明得多。他们早就发现,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,首推文艺,因为唯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的。陈独秀是通过发动“文学革命”来推动社会革命的;胡适学的是哲学,但率先尝试用白话文写新诗;鲁迅本来是学医的,看到国人的蒙昧之后,弃医从文,觉得治精神上的病远比治身体的病要重要得多。这些先贤,能影响中国这么深远,文学这种话语形式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。今天,文学若衰败,其他的知识领域,无论是政治的,还是科学的,必定也受到影响。因为文学关乎人心,连人心都荒凉了,还奢谈什么人文建设、科教兴国呢?

二十世纪有一个大学者,叫钱穆,活了将近一百岁,他的书我是很爱读的。你们不要因为他是国学大师,就对他望而却步,他的文章很好读。钱穆先生有很深的文学情怀,他对文学的看法,往往令人耳目一新。他有一篇文章,叫《读诗》,不长,但充满真知灼见。他说:

不懂文学,不通文学,那总是一大缺憾。这一缺憾,似乎比不懂历史,不懂哲学还更大。

这话是很厉害的。文、史、哲三家,钱穆先生把文学摆在第一位。我们都知道,钱穆先生主要是研究哲学与历史的,但他对文学有崇高的评价,为什么?因为他看到,中国的文学参与了中国生活、中国人生的建设,同时,中国文学也准确地传达和阐释了中国的思想。中国思想里的儒、道、释传统,中国文化里的很多精髓,许多都是通过文学来传承和解析的。像杜甫的诗,显然偏重于儒家的思想;李白的诗,比较接近老庄的哲学;王维的诗呢,更多地和佛、禅的思想相关。通过他们的诗作,我们可以更感



如何才能将这些深刻、宝贵的思想和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对接,大家几乎都一筹莫展。

性、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。所以,钱穆先生在《中国文学史概观》中又说:

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,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,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,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。即如今人生一儿女,必赋一名。建一楼,辟一街,亦需一楼名街名。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,即此为推,可以知矣。

确实,中国人的人生许多时候是诗化的,艺术化的。我们的生活,很多方面都与文学有关。不仅给孩子取名,给楼房、街道取名,要从文学里找灵感,甚至连私人的书房、印章,它的名字或落款是否有韵味,也要看它有没有文气。你的孩子如果叫张福贵或李有财,听起来就一定不如白居易、张恨水那样令人赏心悦目。从孩子的名字里,或多或少可看出他父母的身份和素养,这个判断的标准,还是和文学有关。可是现在的知识界,大谈复兴中国文化时,他们用力的主要方面,还是放在中国的思想哲学上,至于如何才能将这些深刻、宝贵的思想和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对接,大家几乎都一筹莫展。



我认为,大家在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,如果不强调中国文学传统、中国文脉的传承问题,所谓的复兴,就有可能流于空谈。先秦诸子的思想,博大精深,可一般的中国人,哪怕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中国人,有几个能读得懂?很多人在大学读了四年书,《道德经》对他依然是一本天书。但文学不同,它有朴白、感性、容易使人产生亲近感的一面。不仅唐诗还在传唱,古典小说至今读起来不也照样通俗易懂?像我刚才所说的,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,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真是千古绝唱啊!五岁、七岁小孩都可以领会。李白所表达的思乡之情,到现在也还是动人、普遍的情感。又比如《诗经》,它从诞生到现在,有好几千年了,可里面的一些诗句,如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,如果把后面那个“兮”字去掉,它

的意思,小学生也能基本领会。这就是文学的特殊力量,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宝贵遗产。

因此,要复兴传统文化,就得先讲解、学习中国文学,在我看来,这是让人领略中华文化之美最好、最有效的道路。

只是,中国文化经过二十世纪历次政治运动的践踏之后,几乎成了一片废墟。今天,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完整的中国文化的气脉了。这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。可能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这样,如此大规模地蔑视、践踏、焚毁自己的文化。连孔夫子都可以不要,连《红楼梦》都要焚毁的民族,想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。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,几十年就可以使之变成废墟。那些人,何以会对自己的先人、民族的历史如此仇恨?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。前一段读到牟宗三先生的《寂寞中的独体》一书,是去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,里面讲到这个问题时,牟宗三先生说得很深刻:

凡极权专制,一定要毁灭历史,所以秦始皇要焚书坑儒,诗书所代表的是那个老传统中的智慧。秦始皇所以要焚书就是不让知识分子“借古讽今”,因为有个老传统摆在那儿,知识分子就可以说尧舜当年如何如何,和你今天不一样;可以说禹汤文武当年如何如何,和你今天不一样。这就叫“借古讽今”,所以大陆上“文化大革命”就以批斗“海瑞罢官”为序幕。

确实,在历史上,似乎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如此野蛮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,哪怕也经历过狂飙突进的革命运动的前苏联,也不敢说自己这个民族不要普希金、不要托尔斯泰了,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公然践踏孔子、打倒曹雪芹。否认历史,损毁古物,侮辱圣贤,镇压文人,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,你怎么可能再教育他要心存怜悯、胸怀苍生?又怎么可能叫他尊重历史、面对现实?现代人的文化素质低,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,其他专业的人普遍不重视人文素养的自我培育,另一方面



国人掌握汉语的能力,衰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,难道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?

也是整个民族这几十年来抛弃自身传统所造成的恶果。在一些大学生眼中,像董仲舒、朱熹、金圣叹这样的名字,可能比外国人的名字还陌生了。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思议的。以前的中国,强调以文立国,像在座的各位,都属于古代的士人阶层,有些在地方上还做了小官,你们这个层面的士人,放在古代,如果不会写文章,不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,他的官是会当得很狼狈的。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哪怕是正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,连基本的工作总结都写不清楚的,不在少数——国人掌握汉语的能力,衰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,难道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?

现在的一些官员,素质就更加让人无法佩服了。哪怕开一个小小的会,哪怕只是面对自己的下属讲话,离开书面稿,离开秘书为他写好的那些套话,他就根本无话可说。不会即席讲话,说明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成熟的想法,或者从未想过要有自己的想法。他只是一个机械地听命的人,这样的人,怎么能管好一个地方上的事?一切已经今非昔比啊。毛泽东尽管生前主张打倒中国传统文化,并想以造反的方式建立起新的中国文化,但你必须承认,他对传统文化是浸淫很深的,他身上的文化积累、文化传承,底子还是中国的。毛泽东在他的讲话里,引用最多的往往不是马列主义,而是二十四史,是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名著。他是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,并把这种了解贯彻到了现代生活中的。他反传统,是了解了传统之后才反的;可是,现在一些人反传统,连传统是什么都还没弄清楚,你怎么反?只能是把无知当勇敢了。如今的文人、官员,在文采上,和前一两代人比起来,差距就大了去了。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士人阶层走到今天,会出现如此让人感慨万千的状况,个中的原因,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


中国文化从来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,怕的是自己不珍重,陷入“自亡”的境地——中国文化一度确实有一种“自亡”的危机,因为在反传统的旗帜下,国人对自身文明血脉的漠视和践踏,在过去的这一百年达到了顶

峰。所以，哲学家牟宗三说，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，内心不一致，生命分裂。为什么会分裂呢？文化上出了问题：

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，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、尧、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。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，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。结果，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，和五马分尸一样。

说得一针见血。的确，社会再怎样变革，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，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，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，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，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。一个再先锋、再反叛的人，到一定时候，他又得重新回来正视这种文化和他自身的关系的。我说的是一个文化现实，坚硬却真实的现实。你是不是意识到了，这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？你的写作，一定无法摆脱这个文化现实对你的影响。这应该成为今天的文学写作的大背景，成为写作的精神基点。文学是关乎人心、解释灵魂的，如果仅仅用来评一个职称，二级作家或一级作家，意义不大。你们对文学应该怀着更大的抱负，更宽广的视野，并与世界建立起更深邃的对话关系，这样，才能找到写作原初的价值。否则，在广东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，写作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，你根本没必要苦苦地在文学里挣扎。

我为什么要提到上述这个大的文化背景？不否认，我们来到了一片废墟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废墟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了，有一些东西正在复活，还有一些东西正被重新聚拢起来，而文学，作为一个时代的先声，理应对此有所察觉。一个时代的变化，往往是通过文学的变化来预告的。钱穆先生在《读诗》一文中说：

中国要有新文化，一定要有新文学。文学开新，是文化开新的第一



《红楼梦》在实感层面是很实的,但在大的写作意象、精神追求上,它又是务虚的。

步。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,必先从文学起。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,也必从文学起。

五四时期,《新青年》杂志发表的很多作品,现在看来,都有先声的意义,这就在于当时的一些人,已经率先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,同时也写出了新时代来临前的真实感受。我现在读一九二六年鲁迅写的《影的告别》,仍然觉得鲁迅如同二十世纪的中国先知:

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,我不愿去;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,我不愿去;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,我不愿去?呜呼呜呼,我不愿意,我不如彷徨于无地。

鲁迅很早就有关于革命“混有污秽和血”、“将来的黄金世界里,也会将叛徒处死刑”、要作“韧战”准备的忠告,这些,都是一个文学家对要来的世界的一种预感,现在看来,鲁迅是有先见的。又比如《红楼梦》,也对那个时代具有预知能力,成了那个时代的先声。曹雪芹在清王朝还未衰败的时候,就已看出了一个王朝面临衰败的悲怆。《红楼梦》在实感层面是很实的,但在大的写作意象、精神追求上,它又是务虚的。热闹、繁华的生活后面,曹雪芹所传达的其实是一种悲凉、哀伤的情怀。树倒猢狲散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三春去后诸芳尽,各自须寻各自门……《红楼梦》的精神底子是悲凉的,洋溢着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败,这是作家的心灵触觉先行一步所看到的结果,是它,成就了《红楼梦》的大境界。

从这里,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伟大的写作传统,它是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时代、并深刻地见证人心细微的变化的。你们愿意使自己的写作和这个伟大的传统发生关系吗?如果你对自己的写作是郑重的,你就必须认真研究、调查这个时代,以及这个时代的人心万象,你必须对你所写的相当熟悉,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写作理由。真正重要的写作,是需要理由的。



我为什么写作？每个作家都需要接受这样的追问。追问会使一个人深刻，追问也会使写作变得郑重。中外有很多的作家，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，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，比如，博尔赫斯说，他的写作只是为了“消磨时光”；加西亚·马尔克斯说，我写作是为了“让我的朋友更喜欢我”；阎连科说，我目前写作的理由是为了“抵抗恐惧”；王小波说，他的写作理由是，“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，我应该做这件事”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相信，在每个严肃的作家心中，都会有一个问题在折磨着他，那就是，我为什么要写作？我的写作究竟有什么价值？尽管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利，但并不是每一种写作都是有价值的。有些作家，自己花一些钱，将自己的文字印个五百本或一千本，然后辛辛苦苦地从邮局寄出去，但你找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知己了吗？你的文字到达过一个人的心里并使之感动了吗？

美国诗人埃米莉·狄更生有一段著名的诗句说：“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/我便没有白活一场；/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，/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，/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/重新回到它的巢中，/我便没有虚度此生。”这话同样适合用来描述文学写作。如果你的写作没有影响到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心灵，甚至没有影响到哪怕跟自己最亲近的那个人的心灵，这样的写作有什么价值？你又如何说服自己继续写下去？我每次读卡夫卡的作品、卡夫卡的传记，就在想，他为什么要在临死前交待他的好友克罗德将他所有的作品付之一炬？这意味着卡夫卡对自己的写作，一定面临着一个根本的质疑，那就是——我所写的究竟是不是我想说的？我说的究竟有没有意义？这并不是卡夫卡在临死前的突发奇想，这个问题一定是在一开始就深深地折磨着他，唯有如此，他才能写出具有深邃精神先见的作品。鲁迅也是如此，他在自己的遗嘱中说：“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情过活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这话同样蕴含着他对文学、美术的深刻怀疑——没有这样的怀疑，鲁迅就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绝望了。

这大概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：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在



这份契约,要决定你的写作面貌,也将影响你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。

哪里? 一个作家写作的理由是什么?

## 作家和现实之间有一份写作契约

第二个问题。一个作家所提供的写作理由,会决定他和自己的写作、人生以及现实之间签订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契约。这份写作契约,是作家理解现实、表达现实的重要依据;这份契约,要决定你的写作面貌,也将影响你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。你的写作如果是写实的,那就得接受实在世界的检验;你的写作如果是幻想的,那就得接受想象力的考核。写作在精神意义上说是自由的,但在建构经验的宫殿时,却必须服从经验自身的限制,并无多少自由可言。比如你写一个清朝的故事,那么你就只能让你的人物骑马、坐船或者走路,从苏州到北京,你就得让主人公走上将近一个月,甚至更久;又比如你在小说的开头若写了一把枪,那这把枪就得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。也就是说,你写的若是具体的当代现实,那么你所写的,就必须在当代现实中能够被还原,这样的写作,才有可信度和说服力。离开了真实、可信、合情合理这个物质外壳,你的写作就不能称之为现实的写作。但也有另一种情况,比如金庸的小说,他是凭想象写作的,他笔下的武侠世界,是超越现实法则的,可以天马行空,但我们不可忘记,金庸小说中的感情、人际关系,仍旧是符合现实逻辑的——没有这一点,他的小说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。



这种写作上的限制,我把它称之为写作的契约。作家和现实之间的关系,其实都与这份契约有关。或者说,任何的写作,都是作家与现实之间这份写作契约的贯彻与执行。

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理由。比如鲁迅,他的写作理由是为了让人认识“无声的中国”,为了“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”,这就是他和现实之间签订的写作契约。由此出发,鲁迅与中国现实、中国人的生活之间的那种关系,一定是批判性的。鲁迅因为要以文艺救国,要批判国

民性,所以你在他的笔下,很难找到美好的人性和动人的灵魂,他总是残酷地审视、挖掘着人的灵魂中那些黑暗的部分,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自己内心的卑污和阴暗。从他早期的作品,到晚年的杂文,无一例外,他都是往批判国民性、揭露人性黑暗的方向走的。但也有另一种作家,比如沈从文,他的写作,就不像鲁迅那么明确和激烈的,他自己说,写作是为了使“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,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,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”。因此,他的笔调是唯美的,温润的。和鲁迅惯于书写人性的黑暗不同的是,沈从文是努力地通过写作来发现人世的美,书写生命的淳朴和庄严,他说,“我只想造希腊小庙”,“这神庙供奉的是‘人性’”。



这种不同的写作理由,决定鲁迅和沈从文两人,能以不同的眼光来打量世界。鲁迅是尖锐的,甚至是苛刻的,他不是没有悲悯之心,他也有大爱,但他的悲悯和大爱,只能通过一种“强烈憎恶”(沈从文语)、“一个都不宽恕”的方式来表达——这样的方式,当然容易引起误解,所以,关于鲁迅的争论,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,都没有停止过。鲁迅是用恨的方式来表达爱,用曲笔和迂回的方式来把自己对人类的热情藏在心底,他不是直接说出爱、说出热情的作家。因此,要真正理解鲁迅,何其难也。前几天读钱穆先生的《中国散文》一文,他对鲁迅和周作人都评价很高,但钱穆同时也指出,鲁迅在后期“卷入政治漩涡以后,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。实在已离弃了文学上‘文德敬恕’的美德。”——“文德敬恕”一词,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说,他认为写文章最重要的态度,是敬畏与宽恕,钱穆特别推崇这点,并以此来评价鲁迅的写作,虽不够全面,但我以为也有一定道理。一个人的写作,如果带着过多的怨恨,就难以走向宽广和博大。

但“文德敬恕”这话,用在沈从文身上就是合适的。沈从文有一颗仁慈、宽厚之心,他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类的。他所书写的湘西土地上那些平凡的人物、平凡的欢乐和悲伤,都焕发着美丽和诗性的光泽。很多人都知道,沈从文笔下的女性都是美的化身,如《二三》里的三